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 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转换与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徐选国

**【摘要】**社会结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催生了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与快速发展,近30年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形成了以本土化为根本任务的发展逻辑。深入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命题发现,我们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忽视了中西不平等的现代化脉络下知识移植对中国社会工作主体性关切的阙如,导致其陷入狭隘本土化与以他者为中心的本土化双重陷阱之中。本文尝试从“现代化-主体性”框架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特征,阐释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缺乏知识自主性的结构性根源,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分析构建中国社会工作主体性的时空条件,从主体性角度阐释以“中国社会工作”为整体叙事的话语体系重构框架,并从哲学基础、伦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等维度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再生产的多重路径,以为全球治理贡献社会工作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本土化;现代化-主体性;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作者简介】**徐选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上海 200237)。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23.1.177~187,2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的发展型社会工作理论研究”(项目号:21BSH131)、华东理工大学2022年度校级本科重点课题“《社会工作理论》建设”(项目号:JGEDO221001)的阶段性成果。

**问题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知识的自主性阙如缘何发生**

自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香港地区一些高校社会工作学者就内地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内地学者开展了关于华人社会工作本质的研讨,试图回应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对话。<sup>①</sup>这些举措,形塑了恢复重建以来我国内地社会工作发展所具有的典型的外援性特征。学者们试图为社会工作找寻一个具有专业独特属性的本质阐释。但中国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存在着的显著时空差异,使学者们很难为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本质找到一个特别恰当的界定。舶来与内生之间的张力使得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始终处于隐而未现的纷争之下。有学者进一

步结合中国语境下的实践脉络对社会工作的本质进行探寻,<sup>②</sup>但他们仍然深陷不同范式与取向的分歧之中,始终没有找寻到共识性答案。对社会工作本质讨论的回顾,引出了中国需要何种社会工作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学界除了极力探索社会工作本质以外,还积极探索和建构社会工作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由于缺乏本土可用的现成社会工作知识,此阶段的权宜之计是外借知识,移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知识或经验,例如编写教材、翻译图书、介绍经验等,这成为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初期的重要策略。上述举措对于恢复重建之初的中国社会工作而言,起着“雪中送炭”的作用。然而,知识的移植与借鉴并没有跳脱对西方社会工作概念、模式和理论的依赖,进而形成了一种

无法跳出既有理论和模式框架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这种现象体现了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仍然缺乏自主性的现实。回溯中国学界为社会工作发展做出的上述知识移植、理论与经验外借等工作,实质上是试图回答中国社会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这一方法论问题。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要追问,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缺乏自主性的社会工作知识运用与实践?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根本逻辑进行思考。在恢复重建之初,面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中国缺乏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而传统的社会服务体系难以及时有效地解决市场化以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而采取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回顾既有研究可知,学界较为共识性地先借用西方知识,进而以本土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中国社会工作知识的策略性替代。然而,笔者认为,上述知识自主性缺失问题的关键恰恰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我们回到有关本土化的论述中加以反思性理解。

### 社会工作本土化: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工作发展逻辑

#### (一)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意涵及其内在不平等关系

社会工作被普遍视为西方舶来品,因此其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坚持本土化的逻辑就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诸多关于本土化概念的论述中,王思斌有关本土化的界定极其严谨,也最具代表性。他指出,本土化是一种变化和过程,它是指外来的东西进入另一个社会文化区域(“本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一定义强调外来者对它所进入的社会文化区域的适应性变迁,尤其强调要注意后者的主体性,即它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这个本土化的概念非常吸引人,因为外来事物进入我们的语境时,需要在强调我们的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发展。王思斌进一步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进行了界定,他指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任务是用国际社会工作的先进经验来补充、改造我国的社会工作,其前提是进入另一社会文化区域的社会工作在它发生和发挥作用的地

方是成功的,是有经验可谈的,否则它就不大可能进入另一社会文化区域。<sup>③</sup>这一定义蕴含着成功-不成功、优-不优之间的二元关系,实际上承认了先发地的成功和优越性,继而肯定了其知识的合法性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的正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工作由西向东扩散过程中难以考量被传入地的社会文化主体性,导致社会工作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对其生成环境的依赖以及对被传入地的殖民色彩。

由上述定义可知,关于本土化以及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定义本身是易于接受的,然而,用在中西社会工作情境之中,这些概念是存在问题或者陷阱的。费孝通指出,欧美人类学中反映出的“文野之别”内含着人的本质差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处于上升过程,逐渐对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殖民主义心态和霸权行径,制造了不平等的知识传播格局。<sup>④</sup>叶启政在论述社会学本土化时提到,中国社会学是在西方处于中心地位的背景下开展的,由于存在“中心”和“边陲”的知识关系,当“中心”地区的知识传到“边陲”地区时,前者具有对后者的统制关系,而在本土化过程中,后者却未意识到这种不平等的中西社会格局影响着不平等的知识传播。<sup>⑤</sup>笔者认为,社会工作从西方传入非西方国家体现出一种殖民性逻辑。无论是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学,在本土化过程中都面临着(无意识地)不平等的关系陷阱,并伴随着本土化的推进而使得这种不平等关系不断再生产。

#### (二) 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两种陷阱

上面我们看到本土化存在一个从“异文化”到本土文化区域转移、适应的过程,存在着先有的事物比较成功、比较好的预设,在进入没有这个事物的地方时具有优越性,值得后者学习、借鉴。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之初几乎什么都没有,因而很难使用“本土”发展来作为一个具有根本指向的论述。实际上,“本土”一词内涵丰富,但却因为现实的限制而变得无足轻重。所以,社会工作的实践话语、学术话语,都是受“本土化”支配的。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衍生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的两种陷阱。

其一,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种只看社会工作本身而忽视其他根本性要素的狭隘本土化。也就是

说,我们在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时,只考虑传入者的社会工作很先进、很成功、很有经验,因而借来用没问题;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社会工作在西方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形塑、影响,甚至说哪些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质言之,西方社会工作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同时受到特有的宗教、政治、文化、伦理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然而,我们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在一种悬置或忽略了近代中西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只是局限在社会工作本身的本土化,而忽视了更大脉络中的不平等因素在本土化进程中的显著影响。

其二,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种在承认别国成功经验中丧失了自身主体性的他者中心主义本土化。当本土化承认所借鉴之地的成功经验,强调这里的成功经验在移植到新的地方时,要尊重后者的文化主体性,这是很有远见的。但是,需要思考的是:长期占据文化中心主义的社会工作所在地,他们崇尚的那一套在传到后发国家或地区时,是否真的会或者愿意尊重后者的文化主体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殖民主义时代,在殖民地区,殖民国家真的会尊重被殖民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主体性吗?台湾学者瞿宛文在反思台湾地区社会科学本土化时指出,我们是以自以为义的西方现代化概念和价值作为准则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社会,与西方的异同如何?这需要我们对自身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进行反思。社会科学研究忽视了现代化的历史视角,忽略了对自身历史性的记录。<sup>⑥</sup>这与同为台湾学者的叶启政的观点极为一致。从本质上看,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体现出移植性、实用性、加工性、选择性等特点,<sup>⑦</sup>整个本土化进程始终是在承认先发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具有中心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

### 从本土化到主体性: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转化

社会工作本土化呈现出一种依附式的发展逻辑,是一种对知识产生地的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的依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悬置了中国近百年来处于积贫积弱现状的历史事实,是在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脉络之下展开的,而在此过程中,

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则是被动的、落后的。因此,作为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体,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所汲取和移植的知识先天就具有制度化的权威正当性、统制性和高度生机控制性,<sup>⑧</sup>在这种本土化逻辑基础上推进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只能变其形,而不能改其神。这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目前难以突破的阈限。

#### (一)现代化-主体性:理解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建构的新型框架

中国社会工作在恢复重建时,就树立了一个样本、一个母体,认为社会工作基于某单一起源之上而进入不同国家或地区。这种观点缺乏将社会工作(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由西向东传入的过程置于近代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脉络之中。而这种现代化带有很强的支配性、强制性。产生并成熟于西方宗教、文化、政治、历史脉络下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运用于文化、政治、历史等差异显著的中国场域之中,这导致后者缺乏本身的文化主体性,易陷入对先进经验的依附陷阱中,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社会工作虽然在全世界都被视作一种好的制度或专业力量,但是不同国家存在形塑社会工作内在本质的要素差异。

需要思考的是,起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工作在内)学科、知识,具有普适性吗?梁漱溟指出,中、西文化根本上是不相容的,文化可以分为“学”与“器”两种维度,其中,前者为体,后者为用。<sup>⑨</sup>这表明,中西文化存在体、用的差别,如果在体的层面继续沿用西方文化语境下形成的社会工作知识,那势必丧失了社会工作在中国语境下所应彰显的文化主体性。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不考虑知识的本体层面,就难以体现知识的独特性和处境性。<sup>⑩</sup>曹锦清指出,光凭西方传入的理论何以能够切入中国当下的事情?这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对西方传入的概念、理论进行语义学上的重大转换,需要明确这些输入的范畴在中国的经验指称。<sup>⑪</sup>

中国社会工作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移植性、加工性、选择性等性格,揭示了中国社会工作缺乏主体性的深层问题和发展困境。这里主体性缺失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均衡现代化框架

下所开启的一种扭曲式发展。金耀基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要追溯到百年前的鸦片战争,它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一种外发的压力,因而是一种“防卫的现代化”。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侵略,但实质上是西方价值对中国价值、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sup>⑧</sup>这表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被动卷入西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健康的、非正常的现代化。总体来说,这种不平等的现代化进程势必会造就知识传播的不平等关系。

笔者将社会工作纳入中西关系格局,这种格局蕴涵着先发的西方知识体系向后发国家(如中国)移植的优势-劣势关系,制造了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中-西不平等格局,体现出社会工作在向中国移植以及发展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同时,知识分子还成为这种不平等格局的再生生产者。笔者认为,上述中西知识体系的失衡只是一种外形,而更为根本的机理蕴含于更深层面的中西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构体系之中。正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预设和全球同质化论点支配着中西不平等格局,体现出中国在世界体系尤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关系中缺乏主体性特点。这是导致中国社会工作难以体现中国情景的最深层根源。

(二)中国社会主体性:解构社会工作本土化陷阱的透视镜

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逻辑拉回到“现代化-主体性”框架中进行思考和讨论,是解构长期以来不平等的知识传播格局、重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良好生态的内在理论框架。怎么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呢?本文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主体性理论来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主体性是费孝通思想的一贯主题。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作为对现代化的回应。他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sup>⑨</sup>这种适应,既可以通过发掘本土文化中与现代性相契合的要素,进而依据本土文化建构中国的现代化道

路,也可以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的基本规则和技术,在参与现代化的过程中重建自身文化个性。<sup>⑩</sup>因此,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强调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依托的自身文化内核。费孝通强调,之所以倡导“文化自觉”,根本动因在于追寻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主体性”,不能把“文化主体性”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回归”甚至“复旧”。<sup>⑪</sup>

费孝通虽然在晚年才提出文化自觉以作为中华民族面对现代化时的个体或民族集体的行动逻辑,但是,纵观其学术生涯,有关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不同阶段对于文化主体性的追寻或阐释各有不同。20世纪40年代,表征为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工业化浪潮时的艰难抉择;20世纪80年代,表征为从本土文化出发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和重建,试图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核及其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表征为在直面全球化浪潮、参与和学习世界游戏规则与技术的过程中创建新的主体性;进入21世纪,表征为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克服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弊病,对传统“差序格局”赋予新的内涵,形成“新差序格局”,试图推动一个“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世界的建设。<sup>⑫</sup>这是费孝通对中国自身文化主体性乃至全球各种文化主体性的想象和建构。笔者认为,无论是社会工作学科,还是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着上述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任务。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工作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也融入近代以来中西不平等的现代化关系脉络之中。

渠敬东在讨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议题时强调,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并不直接与中国近来国力增强的现实有逻辑关系,而是强调对世界文明有所承担的中国文明体系自始至终都要面对文化自主性问题。<sup>⑬</sup>曹锦清呼吁,中国的研究必须解构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逻辑,回到“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逻辑上来。<sup>⑭</sup>李小云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直面现实,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特殊论的单一范式,避免“中国模式”的政治说教,探索诠释当代中国的新思想资源。<sup>⑮</sup>这些论点极具启发性和前瞻性。

##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重构

在回答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转换以后,我们需要转向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这一根本问题。如果说,过去一百多年来我国推动社会工作发展所进行的知识移植与借鉴是迫不得已中西不对等的现代化格局下进行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必须将社会工作发展置于新的历史时空上来。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完善、中国在全球的版图位置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质言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时空脉络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二是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虽然以西方知识、方法为蓝本,但是经过近30年的专业实践,在专业化、职业化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部分专业实践具有较强的本土导向,蕴含着许多富含中国特性的理论元素,这些对于重构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建构,都是重要的现实基础。

###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时空条件与总体叙事

中国自鸦片战争至今已有180余年的历史,其中有近100年时间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逐渐扭转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尽管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时间(1949—2010)中我国依然处于发展程度较低的阶段,也即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地位与关系格局。2010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实力、科学技术、综合国力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在第一个百年奋斗阶段,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哲学社会科学上也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发展理路。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为理解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理论建构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新的

时空基础。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先后经历了西方技术制度的移植、苏联模式的模仿,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艰辛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sup>①</sup>从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社会主义规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土资源的现代化“出场”构成其基本条件,而真正的主体自觉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最大“历史合力”的决定性因素。<sup>②</sup>只有将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加以整合与连接,才能为社会学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关键钥匙。<sup>③</sup>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内涵的理解需要找回“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从主体自觉的角度重构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及实践逻辑。

在此启发下,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进行推进。上述有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阐释,是在当前中国在世界民族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脉络下提出的,更是在当前世界风云变幻、全球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亟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进全球有效治理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些情景和脉络,为包括中国社会工作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指引。质言之,我们要从过去跟着西方走、以西方为模板的依附式发展逻辑中走出来,立足中国大地、以中国问题为基点构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重新融入全球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之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社会工作的方案和经验。

### (二)主体自觉与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重构

在解构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本土化陷阱,以及阐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逻辑转向的时空要件之后,笔者尝试从主体性视角来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所谓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性,体现为社会工作应该以本土情境为其知识建构的主要源泉,而非不加思索和习以为常地对既有知识进行接受、移植和借用,需要注重本土知识的生产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根本上讲,需要把中国放到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文明相对等的关系上来建构中国乃至世界需要的知识和话语体系,这里既涉及由外向内的逻辑转变,

也涉及由内而内的行动突破,以及由内而外的世界想象,而贯穿其中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自觉。

1. 重新认识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并将社会工作的发展纳入平等的现代化框架之中

要改变过去不平等的现代化及其后果,需要将中国、中国社会工作纳入当下及未来更均衡的现代化框架中,在去西方中心化的基础上构建中西平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格局。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通过“古今中外法”解决了近代中国“古-今”和“中-外”矛盾的长期纠缠。费正清等人强调,要从“历史的深度”来研究中国,通过历史来观察中国就是通过它自己的方式来认识它,制度、思想和文化只能置于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才能得到最佳的研究。<sup>②</sup>费孝通在晚年进行世界民族与全球美好社会的思考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构想,旨在倡导一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相互尊重、互相成就的世界大同景象。<sup>③</sup>日本著名中国研究学者沟口雄三指出:要从多元的角度理解世界,欧洲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日本也是世界的构成部分;要走出以欧洲为既定框架而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化想象,真正做到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sup>④</sup>金耀基指出,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建构的现代性必然是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有“中国性”的现代文明。这种现代化不能继续以西方为中心,也不能一厢情愿回到传统的孤立(过去以中国为中心、天下观等)上,而是要形成“世界中心的”文化观。<sup>⑤</sup>这种“世界中心主义”的观点与当前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所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契合。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否定传统,也不是死守传统,而是再造传统。应当将社会工作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之中,为社会工作发展创设一种平等的现代化语境和脉络。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需要构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2. 再造社会工作的中国语词,以“中国社会工作”命名社会工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

社会工作(social work)不应该是一种具有单一起

源或唯一母体的事物,西方社会工作是一种在现代化进程中生发出来的专业事物,旨在回应因现代化带来的贫困问题及各类弱势人群的需求。非西方国家陆续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以中国为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迈向的主动现代化道路上,尽管存在着许多与先发现代化国家相似的问题,但根本上讲,这些问题的产生要放置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来理解。因此,单纯的西式专业社会工作难以成为普适性手段,难以应对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复杂治理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打破“社会工作”整体或者抽象的形象,解构西方社会工作-非西方社会工作的非均衡体系,构建以地方性知识为核心导向的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形成“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换言之,在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需要以本土的价值(伦理)体系为支撑,需要适宜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需要符合中国人、党和政府等主体行动逻辑的方法体系作为手段。亨廷顿指出,西方普世主义的想法足以造成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西方人对西方文化之“普世性”有三个问题:虚妄的、不道德的、危险的。<sup>⑥</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体现出的是全球化体系中的在地化、多元化的最本质内涵。世界社会工作可以有多种形态、多种类型、多种构成。可以有美国社会工作、英国社会工作,同时也有中国社会工作、南非社会工作等。因此,对中国社会工作进行命名既是对世界社会工作的贡献,也是中国现实之需。以中国社会工作代替更一般性的社会工作,在本质上需要回到社会工作的“中国性”上,将社会工作置于具有中国独特哲学意涵、中国社会理论以及中国独有的党政主导治理模式之中。

在中国,社会工作总体上被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即使较为专项的领域,如禁毒、司法、医务以及精神健康等领域的专业实践,基本上也都被置于社会治理的范畴。换言之,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情境主要是在社会治理中进行的,而社会治理的根本逻辑就在于党建引领,即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在根本上坚持党建核心引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黄晓春指出,党建引领已成为推动多方主

体协同共治和提升基层治理体系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党建通过政治引领、激励驱动、网络整合等机制,有效回应了治理过程中的诸多挑战,对于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sup>②</sup>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能够发挥服务型治理的显著作用。<sup>③</sup>上述论述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语境,因而也为中国社会工作内生性地进行本土理论建构提供了真实场域,有助于改变以往以西方理论为纲、以中国经验为素材的做法。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需要的是能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政策导向及大局工作进行的社会工作,能够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对相关复杂问题的社会工作,能够将公共服务资源、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有效输送给有需求群体的社会工作,能够发挥专业优势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多元需求的社会工作,能够依托社区、有效参与基层治理体系并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工作。

3. 深入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专业自觉

本文在关于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建构方面吸收了费孝通关于文化主体性的许多思想,这表明文化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重要性。这里的文化既包括传统的文化资源,也包括现代社会语境下人们的社会心态秩序及相应的生活行为模式。因此,在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时,需要秉持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核。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sup>④</sup>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为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要将微观个体的文化禀性与宏观社会的文明建构相互结合与融通。

何雪松指出,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框架必须扎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脉络,这就要求社会工

作坚持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进一步而言,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要求其在全球文化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自主适应,而非被动适应;文化自觉要求我们从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中寻求理论支持;文化自觉更是要直面社会工作实践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群体或社区秉持的特定的文化与思想倾向。<sup>⑤</sup>童敏认为,文化自觉是社会工作服务逻辑所认同的价值,这种实践中所遵循的价值标准需要与主流的文化价值标准进行对话。<sup>⑥</sup>文化是理论形成的基础,而理论是文化气质、文化特征的体现。郑杭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论述了其与文化自觉的关系。<sup>⑦</sup>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依托文化自觉助推理论自觉,实现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文军强调,当前中国普遍缺乏社会工作本土理论,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强化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理论自觉。<sup>⑧</sup>何雪松指出,研究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路径。<sup>⑨</sup>徐永祥进一步指出,社会工作要立足自身的“社会”属性,在研究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问题中注重理论自觉,致力于在实践中推动社会建构、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sup>⑩</sup>这将社会工作引向了实践自觉。侯利文在此基础上指出,实践自觉是包括研究者和行动者在内的学术工作者对其所研究的社会以及身处其中的实践有“自知之明”。<sup>⑪</sup>洪大用提出了社会学“实践自觉”的内涵,强调并阐述了实践自觉与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学在文化、理论与实践建构上的紧密关系:实践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又指导、促进着实践自觉,为实践自觉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sup>⑫</sup>

上述有关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之间关系的梳理对于推动社会工作的主体自觉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自觉要强调社会工作者立足服务对象生活历程及其当下的实践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针对性的服务回应过程,强调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建构,尤其要强调社会工作对于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照以及对其美好生活的共同探究。此外,社会工作作为实践性学科,其参与中国社

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在于其专业特质。因此,在众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和专业力量中,社会工作如何凸显其专业优势和效能,如何凸显其专属性或不可替代性,成为十分关键的议题。为了应对这一难题,笔者提出社会工作的专业自觉这一概念,旨在强调社会工作面对新兴的议题和问题时,在无先例参考的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加以回应,体现了作为社会保护机制的社会工作在面对各类问题和风险时的专业使命与本土行动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特质。<sup>⑨</sup>因此,总体上看,社会工作的四大自觉体系是环环相扣、内在相连的,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建构具有根本规定性。

4. 加强社会工作的国际对话,以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为全球治理提供方案

中国社会工作近30年的发展历程更多是由外而内的本土化过程,即更加凸显了从外部移植和借鉴相关知识、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体现了一种“单向度”的行动过程,缺乏知识移植过程中的互动、反思与交互影响。这蕴含着社会工作发展的两大策略:一是由外而内的本土化过程;二是由内而外的国际化过程。关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过程已在前文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从目前来看,由内而外的国际化过程还只是零星的。2000年左右,徐永祥等作为中国代表参与到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等国际社会工作组织之中,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与全球社会工作同行的交流与互动。但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界向外输出的知识、经验是较为匮乏的,某种程度上也与长期以来中西社会工作学术界的的不平等状况有关。费孝通强调,重新更深入地认识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认为,东西方社会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别,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出发点上就与西方文化有分歧。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有好东西,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文化自觉”的使命,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和处理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做出贡献。<sup>⑩</sup>

在近30年的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有一些是中国独特的实践。例如,2003年,由上海市政法委系统

主导推动的三大社团致力于开展禁毒、司法和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先锋领域;与此同时,上海、广东等地出现了面对大量外来务工群体及其子女开展的城市融入、公平教育等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成为中国特有的社会工作实践样态;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灾害社会工作与农村社会工作快速发展,针对中国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灾害实践,探索出许多具有在地特色的知识和实践模式。同时,与农村社会工作相关的是中国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或精准扶贫实践,以及近三年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工作介入经验等。这些实践都是活生生的中国经验,基于这些经验开展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累积和总结。今后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模式,为全球贫困治理、灾害应对、突发事件介入等议题提供中国方案,促进中国社会工作融入国际社会工作体系之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参与。这也响应了前述有关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视野。

### 主体性视域下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维

在回答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转换之后,我们要在主体性视域下推进社会工作知识的再生产。为什么要说“再”?因为我们过去30年来已经有了一套知识,而且这套知识被当作社会工作的普遍性知识加以应用。然而,既有知识很难担负起重构中国社会工作并积极发挥社会建设功能之使命,这驱动着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知识的有效性。因此,在主体性逻辑下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知识生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实践体系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本文将从哲学基础、伦理价值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四个方面阐述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再生产的维度。

#### (一)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

中国社会工作几乎没有哲学基础,这可能源于社会工作长期被视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和职业的缘故。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在吸收、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知识时,很大程度上连同这些知识背后的哲学基础、价值基石等都一同吸纳了,因而缺乏对既有理论背

后的哲学渊源和价值意涵的反思。简春安等人在《社会工作哲学与理论》一书中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他们从五个方面概括了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一是社会工作的政治哲学;二是社会工作的道德哲学;三是社会工作的逻辑;四是科学方法的角色与定位;五是从美学角度探讨社会工作的艺术性与科学性。其中,社会工作的政治哲学主要讨论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资源分配的正义性、福利权益的平等性等议题;社会工作的道德哲学主要强调伦理的本质是后设性与规范性的,强调知识本质上具有权威性,突出资源分配背后的意义等。在此基础上,简春安等人从内省哲学(存在主义、意义治疗、功能主义、女性主义、认知理论、建构理论)、外观哲学(行为学派理论)、混合哲学(精神分析理论)、实用主义哲学(问题解决式社会工作、任务中心模式社会工作、危机处遇模式),以及其他理论(系统理论、角色理论、生活模式理论、权能增强视角、优势视角、后现代理论)等方面系统地呈现了社会工作哲学与理论之间的关系。<sup>④</sup>这种对社会工作哲学基础的讨论似乎尚未触及社会工作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本质的理解,缺少对中国本土哲学的挖掘与建构。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蕴涵着社会工作者如何理解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世界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面向,这就需要将中国哲学中有关人、天、家国等核心范畴纳入社会工作的哲学维度之中。哲学基础可以为中国社会工作提供价值根基,然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缺乏的根本维度。在重构中国社会工作哲学基础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反思性地与西方社会工作遵循的宗教伦理、天赋人权哲学与价值观进行对话。

## (二)社会工作的伦理基础

社会工作十分强调伦理特性,西方社会工作为全球社会工作提供了伦理规范和标准。梁漱溟指出,“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是关系,皆是伦理”。因此,伦理讲的是关系,梁漱溟指出,中国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以伦理来组织社会”。“所谓伦理者无他义,就是要人看清楚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

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着”。<sup>⑤</sup>这是有别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伦理现实,从上述中国伦理观点中可以找寻到有利于推动社会工作之利他、助人、互助价值实现的本土伦理基础。与伦理本位的社会观密切相关的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思想,他指出,与西方社会结构体现出的团体格局相异的是,中国的乡土社会结构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受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波纹所推及的就会发生联系。<sup>⑥</sup>这种以“己”为中心形成的一圈一圈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现实表征。这与儒家思想强调的“推己及人”思想具有内在连通性。关于伦理的意涵还暗含着中国人独有的“公私”观,沟口雄三指出,中国的公对应着天理、私对应着人欲,体现了较强的伦理性。对中国的研究整体上不应以国家、社会等场域的意象来把握,而应作为关系拓展的对象来把握;个体应该作为关系的集结点,将个体放在关系中来把握才最接近实际情况。<sup>⑦</sup>因此,社会工作伦理应回归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它充斥着人与人、人与天的伦常秩序,这是有效推动中国社会工作融入服务对象生活实践的关键阀门。

## (三)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

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经历了从学科外借到学科自生、从微观理论到宏观理论,并在实证主义、人本主义、批判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几大范式之间同时展开,这些理论之间有交叉也有争论,体现了不同理论背后的“政治”之争。<sup>⑧</sup>关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倡导性的研究成果。多数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问题主要是宏观社会理论的缺位,宏观社会理论对于整个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中观、微观层面的理论在不同场域之中具有一定的互通性。过去,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主要依赖于西方成熟的实践理论,这些理论多数属于微观或中观层次的实践理论,对这些理论的借鉴缺少双重反思:一是忽视了西方社会工作微观理论、中观理论背后的宏观社会理论基础;二是忽视了在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时如何寻求与中国宏观社会理论的衔接。实际上,中

国社会工作理论目前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缺乏本土理论的根基,换言之,由于缺乏应有的哲学基础,导致社会工作理论大厦没有根基,而从西方借用的理论在中国语境中使用的时候又会出现与“地基”(真实的社会及其规律)不相符合,并且出现摇摇晃晃的情形。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基于中国现实社会运行规律的哲学基础进行构建,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次相互衔接的理论体系。我们要把社会工作纳入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现实逻辑中来考量,立足中国来构建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古今社会理论、百年中共党史及其理论成果、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观及其实践智慧等,均可成为构建中国社会工作的主要理论来源。今后需要将既有的碎片化理论观点整合到学科发展与实践演进相结合的双重脉络中加以系统性建构。

#### (四)社会工作的方法体系

西方社会工作在方法上较早形成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这三大方法被移植到中国并沿用至今。近几年国内教育界尝试从微观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工作两大维度对原有的社会工作方法进行重新界定。但不管是三大方法还是两大方法,在具体服务实践中经常存在割裂使用的问题,导致不同方法所面向的服务群体被人为地区隔开来。例如,某个个体所面临的问题是由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所导致,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某类遭遇相似处境的群体所共同面对的。因此,对这个个体或群体开展的服务不能割裂地分别采用不同方法,而是需要在服务方法、理论运用上进行整合。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开始倡导整合性社会工作的运用,但是这种整合取向是在专业话语内部展开的。还有学者则尝试突破专业本身的逻辑,尝试探索专业社会工作与党的群团工作的融合发展之道。这些论述尝试将社会工作拉入传统上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服务系统之中,并寻求二者的融合发展。近30年的社会工作实践表明,以个案、小组和社区方法推进时,社会工作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使得社会工作并不能在嵌入原有服务系统的过程中获得发展,也因此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以融入党的群众工作

方法来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已在广东和长三角部分地区付诸实践,即坚持党建引领的逻辑开展社会工作,将社会工作纳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框架之中,以党的社会工作的方式开展服务。在此过程中,党建可以为社会工作提供政治优势和资源网络,为社会工作更好地扎根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核心场域。<sup>⑥</sup>目前,在专业实践中,越来越多实务工作者在经历了党建引领社会工作的实践后越发体悟到社会工作在党建引领下的发展更为顺畅。关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方法创新,笔者认为,选择以最容易接近服务对象、最容易让他们信任的方式,将是破解中国社会工作长期悬浮式运行的关键落脚点,群众工作方法恰恰是最有效的本土社会工作方法。

#### 结语

本文尝试解构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命题,揭示了其面临着忽视更深层次元素的狭隘本土化以及以他者为中心的本土化双重陷阱,分析了导致本土化陷阱的根源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忽视了中西不平等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知识移植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工作主体性关切的阙如。进而,本文尝试从“现代化-主体性”框架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特征,将中国社会工作纳入现代化进程中加以审视,从现代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知识自主性缺失的结构性根源,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分析了构建中国社会工作主体性的时空条件,进而从主体性角度阐释以“中国社会工作”为整体叙事的话语体系重构框架,并从哲学基础、伦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等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再生产的多重路径,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建构。

从根本上讲,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起点以及知识再生产都应该置于中国的现实语境之中。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就是镶嵌在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脉络之中的,尤其是自2006年开始被纳入中央宏观议程以来,社会工作已成为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通过共建共治共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需要重新识别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主导情境,并把社会工作置于这样的现实情境中,以微观实践折

射宏观社会建构目标,这应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宏观社会想象和专业实践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做的工作仍然是探索性的,我们要在平等的现代化语境下推动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要从中国历史-当代语境中寻找知识生产的原动力,推动党建引领社会工作的机制创建与有效路径探寻。本文强调从本土化到主体性的逻辑转换,就是试图在重新理解和建构中-西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具有中国社会主体性的基础上探究中-西知识交融和共存的路径,在西方经验之外为世界社会工作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

#### 注释:

①何国良、王思斌:《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台北)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第151-172页。

②徐永祥:《论现代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中的建构功能》,《学海》2005年第1期。

③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④费孝通:《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麻国庆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88-292页。

⑤⑧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31-33页。

⑥瞿宛文:《省思后发社会的学术本土化——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

⑦徐选国、田雪珍、孙洁开:《从外部移植迈向本土自觉: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逻辑》,《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0期。

⑨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15页。

⑩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⑪⑬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6-77、67-70页。

⑫⑭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⑮⑯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⑰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

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⑱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⑲渠敬东:《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⑳李小云:《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与文化自觉》,《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

㉑刘守英:《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㉒张跃国:《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生成条件》,《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㉓洪大用:《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㉔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14页。

㉕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

㉖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0-133页。

㉗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61-162页。

㉘黄晓春:《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㉙王思斌:《社会工作在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作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㉚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㉛何雪松:《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社会建设》2014年第2期。

㉜童敏:《社会工作理论的文化转向及其文化自觉》,《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㉝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㉞文军:《增强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自觉》,《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0日。

㉟何雪松:《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㊱徐永祥:《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使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㊲侯利文:《社会工作知识论基础的再认识——兼论社会工作的实践转向》,《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5期。

㊳洪大用:《增强社会学的实践自觉》,《人民日报》2019年5月20日。

③徐选国:《专业自觉与体系之外:社会工作介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防控的双重逻辑及其反思》,《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④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406-407页。

⑤简春安、赵善如:《社会工作哲学与理论》,(台北)远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9-20页。

⑥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79页。

⑦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27页。

⑧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9-11页。

⑨马尔科姆·佩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三版),冯亚丽、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⑩徐选国、黄景莲:《从政社关系到党社关系: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情景变迁与理论转向》,《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 The 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New Era

Xu Xuanguo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have given birth to the restor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Nearly 30 years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practice has formed a development logic that takes indigeniz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A deeper reflection on the proposition of indigenization reveal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ing and borrowing from Western social work knowledge systems, we have overlooked the lack of concern for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social work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equal modern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eading to the double trap of narrow localization and west-centered indigen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feature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from the framework of "modernization-subjectivity", explains the structural root of the lack of knowledge aut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time and space cond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iscourse system reconstruction framework with "Chinese social work" as the overall narrative, and puts forward multiple paths of knowledge reproduction of Chinese social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y, ethics, theory and method, so as to contribute China's experience and paradigm of social work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indigenization; modernization-subjectivity; Chinese social work;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